

特載

從中共外交政策的演變看中共當前的 基本外交政策

尹慶耀

在中共的詞典裏，對於外交政策的解釋是：「一國的對外政策，稱爲外交政策。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與它的內政政策分開的，而一個國家的內政政策則又取決於它的政權性質。……有怎樣的政權就有怎樣的外交政策，也就只有怎樣的外交政策」^①。

作爲一個政權，中共有其「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反映在對外政策方面，就如同諾色吉(F. S. Northedge)所說：國家政策作爲者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指出國家的各種對外利益，然後再根據某種相對重要性來對其作有秩序的排列。諾色吉所提出的秩序是：第一優先是自保(Self-Preservation)；其次是獨立(Independence)，那包括有相當不受干涉的自由，對外也有某種程度的權力，足以表示和執行一種獨立的觀點；最後才是維持其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權威或地位^②。就這一方面說，中共和一般國家並無二致。

作爲一個共黨政權，中共又有其國際主義的任務，它對國際事務的分析與作法，不能不受馬列主義意識形態(Ideology)或世界觀(World-View)的影響，而其對外活動的終極目標是依照馬列圖式改造世界，那也是不容易改變的。就這一方面說，中共和一般自由國家有所差異。

中共承認「外交爲內政的延長」^③，內政的變化會反映到對外政策上。而中共處在國際交往密切的當前世界中，也不能不受

註① [新名詞辭典]，「外交政策」條，上海：春明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〇〇七七頁。

註② F. S. Northedge, "The Nature of Foreign Policy" in F. S. Northedge, ed.,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Power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pp. 16-18.

註③ [新名詞辭典]，「外交」條，〇〇七七頁。

國際政治環境或局勢的影響。當然，在共黨式的極權政治體制下，對外決策中的個人因素也不容忽視，但與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及戰略策略相比，毋寧說後者更為重要。也祇有從此一角度觀察，才能瞭解共黨政權對外政策的延續性。

不放棄世界革命最終目的的共黨政權，必然更重視它自己在國際社會間的政治權力 (Political Power) 和政治影響力 (Political Influence)，消極方面是不願從屬或受制於他人，積極方面是要影響他人、控制局勢、使國際情勢的未來取向適合自己的需要。

一個共黨政權，除了處於大的國際社會之外，還處於一個共產集團或稱社會主義陣營之中。這個集團內的各個成員國，彼此間也有互動關係。一個共黨政權也願在其間保持獨立，進而維持、發揮、增高自己在這個集團中的影響、權威或地位，甚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爭取領導權。

中共在對外政策中，如何將意識形態、國家利益和權力鬭爭 (Power Struggle)，各擺在適當位置，那祇有靠短程 (策略性) 和長程 (戰略性) 等計劃來作安排了。

中共對外活動，係將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民分別對待^④。它認為：「在社會主義陣營形成以後，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要處理三個方面的關係，這就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關係，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關係」^⑤。它的對外活動係分：國家對國家的外交 (State to State Diplomacy)，人民對人民的外交 (People to People Diplomacy)，同志對同志的外交 (Comrade to Comrade Diplomacy) (即黨與黨的關係) 三方面進行。這些作法對於上述的安排，也許會提供若干便利。

本論文擬以前述各項基本概念為依據，試從中共外交政策的演變，來剖析中共當前的基本外交政策。

二

本論文題目中所謂「當前」，係指八十年代而言。惟欲明瞭當前中共的基本外交政策，又不能不對前此中共外交政策的演變，作一番回顧與檢視。

從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起至七十年代末，其外交政策可以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侵略捷克事件為分水嶺，大別為兩個時期

註④ 參閱中國共產黨湖北省委員會寫作小組：「團結人民戰勝敵人的強大武器——學習『論政策』」，〔紅旗雜誌〕(一九七一年)第九期。

註⑤ 「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共：〔人民日報〕(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又，〔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三〇三頁。

。前一時期以反美爲主，後一時期以反蘇爲重。但每一時期，又可細分爲若干階段。

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死亡，是中共向蘇聯「一邊倒」階段，那符合中共的意識形態與現實利益。曾隨同周恩來於一九五〇年赴蘇聯談判「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伍修權，在同憶中對當時雙方簽訂的條約和協定給予很高的評價。同時指出「一邊倒」的「國策」，是要打消史達林對中共的懷疑，「拆了美國對華政策的臺」^⑥。在史達林的權威下，當時中共是沒有獨立地位的。

一九五三年是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的一年，蘇聯提供了不少援助。一九五四年九、十月間黑魯曉夫訪平，與中共簽署一系列文件。蘇軍撤離旅順，將海軍基地管轄權讓渡中共；蘇聯轉讓雙方合營公司中的股權，由中共逐年以物資抵償；蘇聯對中共提供新貸款五億二千萬舊盧布（一億三千萬美元）；蘇聯協助中共增建十五項工業企業項目，並擴充一四一項企業設備，估定款額爲四億舊盧布。這一階段，堪稱北平和莫斯科的蜜月期。

大致說來，截至五十年代前半，中共和蘇聯對國際問題的立場是一致的。中共的外交活動也以對共黨國家爲主。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共在北平召開過亞、澳工會代表會議。一九五二年十月，亞太地區三十七國和平代表在北平集會，決議在平建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聯絡委員會（The Peace Liaison Committee of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s）。蘇聯是兩次會議的參加者。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來率團參加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將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與印度簽訂西藏地區和印度通商和交通協定公報中所倡和平共處五原則發展成爲和平十原則。當時蘇聯只派觀察員（Observer）列席，但並未有異議。

中共和蘇聯的齟齬，始於一九五六年二月的蘇共二十次大會。毛澤東不同意蘇共的反史運動，對黑魯曉夫在大會報告中所提「和平共處」、「和平競賽」與「和平過渡」也有異議。那是意識形態與革命策略的分歧。反史運動引起東歐動亂，一九五七年初，周恩來應黑魯曉夫之請赴東歐收拾善後，其時蘇聯國際地位降低而中共聲望增高，必然導發了毛澤東的權力野心。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次世界共黨會議，爲戰爭與和平問題同蘇共發生爭執。另一項爭論是關於「兄弟黨關係的準則」，中共強調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實行聯合的原則，通過協商達到一致的原則」，不能有「上級黨」和「下級黨」之分^⑦。這是向蘇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挑戰。

註⑥ 伍修權：「在外交部八年的經歷」，自一九八三年八月廿二日起，在香港《文匯報》轉載，所引見同月廿三、廿四日該報第三版。

註⑦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來信的復信（六月十四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上冊，四四—四四五頁。

如果說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三日中共掀起金馬砲戰，是其戰爭路線的表徵；那麼一九五九年九月黑魯曉夫訪美，與艾森豪總統創造大衛營精神，則是蘇聯和平攻勢的高潮。五十年代後半是「中」蘇齟齬時期，由於二者各行其是，終導致六十年代的分裂，影響到中共的對外政策及整個世局。

三

中共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應當包括下列內容：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下，發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關係；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鬭爭」^⑧。

中共要求在平等的基礎上與社會主義國家團結；和平共處只適用於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間，不能引伸到被壓迫者與壓迫者的民族、國家、階級的關係方面^⑨，它反對蘇聯把和平共處作為對外政策總路線。中共一貫遵從列寧的策略，重視民族解放與反帝鬭爭。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美國帝國主義是世界反動勢力的主要堡壘，是國際憲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⑩。這是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中共同蘇共爭論的主要論點。

一九五九年六月廿日蘇聯片面撕毀「中蘇原子合作協定」及「國防新技術協定」，停止協助中共發展核武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蘇聯通知中共，將在一個月內撤走全部在大陸工作的蘇聯專家一、三〇〇餘名，撕毀幾百個協議與合同，另外取消互惠發行雜誌的協議。使雙方由意識形態的分歧發展成國家利益的對立。

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中共政權成立十一週年紀念，除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凱萊齊（A. Kellezi）外，共產集團並無高級人員參加。衆多外賓大部來自亞、非、拉丁美洲。紀念會中，天安門上毛澤東兩旁為緬甸總理宇努（U NU）與阿爾及利亞叛軍領袖阿巴斯（Ferhat Abbas）。中共正規軍僅儀仗隊參加，未舉行閱兵，五十萬人大遊行則以民兵為主。這顯示中共已決心與蘇聯和平共處的對外策略分道揚鑣，它要以「人民戰爭」方式，在亞、非、拉丁美洲掀起反帝反殖的革命。

不過，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劉少奇在慶祝中共建黨四十週年大會講話中所提到的中共對外政策，仍然是前述的三個方面、三項內容，並將蘇聯列在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之首。

註⑧ 「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上冊，三〇三—三〇四頁。

註⑨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上冊，三三一—三四頁。

註⑩ 同註⑨，一三頁。

一九六三年七月五日，鄧小平率團赴莫斯科，與蘇共商談改善兩黨關係不成，於廿一日返平。但美、英、蘇三國局部禁試條約，却於同月廿五日在莫斯科成立。黑魯曉夫似擬緩和對西方關係，集中精力對付中共。中共乃：(一)自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連續發表九篇評論文章（九評），與蘇共展開理論鬭爭，內容包括國內建設、革命策略、對外政策路線等；(二)一九六四年一月廿一日「人民日報」以「全世界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力量聯合起來」為題，提出「中間地帶論」，作為組織國際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三)一九六三年底至一九六四年初，周恩來率龐大代表團訪問亞非十三國，籌開「沒有白人參加的」第二次亞非會議，擬將美蘇勢力逐出亞非地區；(四)一九六四年三月卅一日中共發表「無產階級革命和黑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一文，首次公開指蘇共為修正主義，使中蘇兩共黨愈加對立。

「中間地帶論」，仍以反美為主，亞、非、拉即第一中間地帶是反美反帝的主力；整個西歐、大洋洲和加拿大（後又加日本）是反美統一戰線中可以聯合的對象；「蘇聯領導人追求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夢想」，當然不在這個統一戰線之內。

中共除於一九六四年一月與法國建交外，在第二中間地帶並無若何成就。其活動重心乃在第一中間地帶。

本來，中共政權初期，其對外活動大多以亞太地區為主。一九五六年五月始與埃及建交。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周恩來抵達開羅訪問，是其最初踏上非洲土地。但此後中共乃積極向非洲進軍，並擴大大其影響力及於拉丁美洲。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黑魯曉夫被黜。十一月四日周恩來率團赴蘇參加十月革命四十七週年紀念，試探同蘇聯改善關係被拒^⑩。一九六五年，中共在亞非地區的活動漸趨下坡，同年九月三十日中共支持的印尼政變失敗，稍後第二次亞非會議也宣告流產。

自五十年代大躍進失敗以來，毛澤東退居第二線而漸失其權力，再加上六十年代中期對外路線的挫折，使其自覺地位不穩。乃籌劃從上海的「小中央」向北平的「大中央」反攻。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使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點燃文化大革命的信號，其目的是「在全國人民中更加牢固地扎下毛澤東思想的根子，徹底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挖掉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本」^⑪。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兩編輯部發表聯合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對外與蘇聯「劃清界限」，聲言彼此「在當代一切根本問題上針鋒相對，有互相分開的東西，沒有聯合起來的東西，有對立的東西，沒有共同的東西」。同時宣稱「當前世界形勢的特點是，在國際階級鬭爭日益深入的情況下，正在經歷着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從一九六六年起，中國大陸展開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共的內政外交都進入狂飆時代。

^⑩ 其時布里茲涅夫 (Leonid I. Brezhnev) 面告周恩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上，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他們（布等）同黑魯曉夫沒有一絲一毫的差別」。見「人民日報」、《紅旗》兩編輯部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

^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紅旗雜誌》（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第八期社論。

文化大革命的口號是「造反奪權」，目的是反修防修。對外進行造反外交：（一）在國際共黨及共產集團內，支持反對派或另組「馬列主義」黨，進行分裂路線；（二）在非共國家中，支持反政府的勢力（政黨、團體、個人），執行人民路線；（三）在亞、非、拉丁美洲尤其是東南亞及南亞、中東等地區，支持共黨游擊武裝，建立叛亂路線。且到處散發毛語錄、毛像章，實行革命輸出。

截至六十年代中期，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勢力（或稱毛派），對內對外都重視意識形態、革命策略與權力鬥爭，這與毛澤東的個性與處境也不無關係。但它不承認蘇共所謂中共「爭奪領導權」的指摘。中共在「七評」中有一節題為「駁所謂『爭奪領導權』」，其中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指出，英國的工聯運動和法國的工人政治鬥爭，曾先後處於各國無產階級運動的前列。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後，恩格斯說過：『現在德國工人是處於無產階級鬥爭的前列』」，「列寧在一九一九年說過：『革命無產階級國際中的領導權暫時（自然是在一個短時期內）轉到俄國人手中去了』」。如果一個處於前列地位的黨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儘管它是最大的、最有影響的，那就必然喪失前列的地位」^⑬。顯然，中共不承認蘇共再處於前列地位。

在「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一文中，中共寫道：「共產主義學說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張的無產階級的國際聯合，是為實現無產階級在全世界範圍的偉大歷史使命而奮鬥的聯合」。「在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鬥爭興起的歷史條件下，列寧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這個口號，促進了西方各國的工人運動同東方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聯合鬥爭。這是國際革命力量更加廣泛的聯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毛澤東同志根據國際階級關係和力量對比的新變化，提出了建立國際反美統一戰線的口號。這個統一戰線，以國際無產階級同被壓迫民族的聯合為基礎。……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關於世界革命所提出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戰略思想」。這樣，就把毛澤東和馬克思、列寧並列為三。

進入文革期間，中共會稱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峯」^⑭。又宣稱「今天，世界已經進入了以毛澤東思想為偉大旗幟的革命新時代」^⑮。如此鼓吹之後，再隱諱中共爭奪領導權的企圖，就不太可能了。

註⑬ 「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文章，〈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下冊，三五七—三五八頁。

註⑭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註⑮ 「布達佩斯的一幕醜劇」，《人民日報》（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評論員文章。

一九六六年三月中共未派團參加蘇共廿三次大會，此後中共黨大會也不邀請外國共黨參加。中蘇共間黨的關係斷絕。同年十二月起，中共除留黃華在開羅外，開始將其駐外「大使」及高級外交官員召返大陸參加文革，使得中共在國際間絕對孤立。自一九六七年八月以降，中共已不許其駐外使館輸出文革。但最大的改變却是一九六八年八月廿一日凌晨蘇聯率華約五國軍隊侵入捷克事件所引起。共黨國家相互間用武，使中共畏懼同樣事件會在中國大陸重演，於是它的對外政策，就不得不以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為重。

儘管文革期間強調反帝必須反修，但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中，仍只強調建立最廣泛的反美國國際統一戰線，惟「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奉行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當然不包括在這個統一戰線之內」。

捷克事件後中共有幾項措施：（一）一九六八年八月廿三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總破產」，斥蘇聯墮落成「社會帝國主義」；（二）九月十七日毛、林、周致電阿共第一書記霍查（Enver Hoxha）及總理謝胡（Mehmet Shehu），支持其退出華沙公約，聲言「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已經開始」，預示中共對外戰略策略，將作重新部署；（三）十月一日中共駐捷克「大使館」邀請其最先指為現代修正主義的南斯拉夫官員參加其慶祝活動；（四）同年十月十三日至卅一日召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十一月一日發表公報，對內永遠開除「中國的黑魯曉夫」劉少奇的黨籍，對外指美蘇互相默契與支持，首次號召「一切被美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所壓迫的人民，應當結成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即反美反蘇統一戰線。又，十一月廿六日中共「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談話，宣布中共已向美國建議，定一九六九年二月廿日恢復華沙會談，聲稱中共一貫主張要美國同意「中美兩國簽訂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協定」^⑩。顯見中共爲了對抗蘇聯，已將國家利益置於較意識形態更爲優先的地位。

一九六九年中共和蘇聯有珍寶島衝突，同年十月廿日起雙方在北平舉行副外長級的邊界談判。談判開始前，中共重申其從一九六四年二月雙方第一次邊界談判的立場而更具體化，可歸納爲：（一）原則鬭爭要長期繼續，但不妨礙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國家關係正常化。（二）蘇聯須承認帝俄時代之中俄條約爲不平等條約，但中共仍願以此等條約爲基礎合理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三）中共不要求收回一八五〇年以降俄國根據條約割佔的中國領土（一五〇萬平方公里），違約多佔的領土（爭議地區，三三、五〇〇平方公里）原則上應歸還對方，但可作必要的調整；（四）邊界未解決前，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從中蘇邊界一切爭議地區撤出或不進入，脫離接觸。

原則鬭爭屬於意識形態與革命策略，中共要長期堅持。又將和平共處五原則適用於同蘇聯的關係，意味着中共已不將蘇聯視

爲社會主義國家。

中共一方面與蘇聯從事邊界談判，另一方面於一九七〇年一月與美國恢復華沙會談。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共發動乒乓外交，導致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北平和華盛頓之間，就由「人民對人民」發展成「國家對國家」的接觸。中共在對美蘇展開又談判又鬭爭的同時，又一再宣稱自己永遠不作超級大國，而在國際間鼓吹反超大鬭爭。

五

一九七四年二月毛澤東對訪問中共的桑比亞總統卡翁達(Kenneth D. Kaunda)談稱：美國和蘇聯構成第一世界；中間的力量，例如日本、歐洲和加拿大，都屬於第二世界；「我們和你們」則屬於第三世界(亞、非、拉丁美洲)。這是六十年代中間地帶論的延長與發展。

同年四月十日，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關於原料和發展問題的第六次特別會議中，就公開宣布了中共的「三個世界論」。這原是一項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戰略部署計劃，它以第三世界爲反霸的主力軍，以第二世界爲反霸統一戰線中可以聯合的力量，以第一世界爲孤立打倒的對象。而且在鄧小平講話中，蘇霸比美霸更具「危險性」，那就將敵人分出主次。但由於鄧小平宣稱「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招致蘇聯、其他共黨甚至連阿爾巴尼亞也抨擊「三個世界論」是放棄了無產階級的立場。

「三個世界論」是由下述毛澤東的三句話演化而來，即：一個世界，兩家，三分天下。毛澤東認定「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⑩，因此，一個世界乃是個革命的世界；講革命就只有兩家：剝削階級與無產階級，沒有第三家^⑪，講統戰就可有三個世界的劃分，以便聯多打少。在統戰範疇內，第三世界各國政府都可拉來作反霸的主力軍。在革命範疇內，中共仍支持各國共黨推翻其「反動統治階級」的革命。前者屬國與國的關係，後者屬黨與黨的關係。建交不能促使中共保證不支持各國共黨或左翼勢力。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死亡，蘇聯擬乘機改善同北平的關係，但中共拒收蘇共的唁電。同年十一月二日，李先念同法國記者談話，要求蘇聯重建史達林主義。六日譚震林告菲律賓賓記者，要消除中蘇共黨意識形態的鬭爭，至少需要一千年，甚至可能要一

註⑩ 一九七〇年五月廿日毛澤東爲美軍入東發表的聲明：「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人民日報》（一九七〇年五月廿一日）第一版。

註⑪ 一九七五年五月廿日中共「外交部」部長喬冠華在天津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禮堂所作關於當前世界形勢及中共對外政策的講話。〔中共機密文件彙編〕，臺北：政大國研中心（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初版），三九五頁。

萬年^⑩。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通過的中共「十一大」黨章中，將「蘇」霸置於「美」霸之上。

一九七八年四月阿富汗政變，親蘇的塔拉基(Noor M. Taraki)接掌政權。六月，與中共關係轉惡的越南，加入蘇聯集團的「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使中共有身受包圍之感，乃於同年八月與日本簽訂拖延已久的「和約」(十二日)，華國鋒往訪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歸途訪問伊朗。又於十二月十六日與美國發表建交公報，決定於翌年元月一日正式建交。中共既以低姿態拉住美、日，乃使對蘇聯爭國際化，自身得稍卸仔肩。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歐尼爾(Robert O'Neil)說，一九七八年以降，中共對於同蘇聯的戰爭不可避免的警告，實際上業已消逝。中共認為它已不再受蘇聯的直接威脅^⑪。自與上述種種有關。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廿二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踐派」壓倒「凡是派」，確立了鄧小平路線，決定把全黨工作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自然也影響到對外政策。

一九七九年中共確曾有過進攻越南(二月)和通知蘇聯不延長同盟條約(四月)的緊張事件，但同一年中共即將蘇聯的內政與外交分別對待，承認蘇聯為社會主義，指摘蘇聯對外實行霸權主義。同年十一月「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特稿中，報導中共內部傳閱文件中即有此內容^⑫。十二月蘇軍進侵阿富汗。據稍後日本獲得中共一九七九年底執筆、一九八〇年初在黨內傳達的機密文件，內容指越南將成為蘇聯的包袱，使蘇聯分擔其困難。又稱蘇聯的主要力量非指向中共，而是對付美國^⑬。在此一國際環境下，中共的外交政策就又有新的方向。

六

蘇軍入侵阿富汗使東西關係緊張，一九八〇年一月四日，美國宣布對蘇實施制裁的同一天，放寬對中共購買某些商業和軍事兩用的技術及若干軍事項目的限制。同月上旬，美國國防部長布朗(Harold Brown)訪問中共。這對中共是有利的。十六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幹部會議上，提出八十年代中共的三大任務為：反霸、統一、現代化。十九日片面宣布將一九七九年九、十月間開始的「中」蘇副外長級關係正常化談判延期，蘇軍不退出阿富汗即不再恢復。三月十一日，中共「國防部」副部長粟裕在北

註^⑩ 需要鬪爭一萬年，乃毛澤東對史諾(Edgar Snow)談話中口吻。史諾著陳雲翻譯·「漫長的革命」，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六月初版)，一八七頁。

註^⑪ 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五月七日)第二面。

註^⑫ 「紐約時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第三頁。

註^⑬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九日)第七面。

平會見日本防衛廳官員，要求日本將其防衛經費提高到國民總生產（GNP）的〇・九%以上^②。四月廿九日中共「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對日本自民黨幹部長中曾根康弘談稱，美軍撤出日本對亞洲不利。他贊成美日軍事同盟，認為美日安保條約「對東亞的和平與穩定是有利的」^③，並要求日本防衛經費提高到國民總生產二%^④。

可是，另一方面，一九八〇年二月廿三日中國大陸各省在蘇聯陣亡將士紀念碑前放置花圈，是長久以來所未有的事。三月廿日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司長、中共與蘇聯關係正常化談判蘇方代表團副團長卡比察（Mikhail Kapitsa 現已升任副部長）以解決蘇聯駐平使館內部事務為名飛抵北平，但會與中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于洪亮（現亦升任副部長）會談三十分鐘。四月九日（「中蘇同盟條約」失效前一日）法新社發自北平的報導，北平「市政府」已下令將蘇聯大使館所在的「反修路」改名「東直門北中路」^⑤。

一九八一年初，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古杜希尼可夫（L. M. Gudoshnikov）博士對日本共同社記者指出，在中共內部「蘇聯修正主義」一詞已經消失，在官方場合也不使用了^⑥。那是一項大的改變，意味着「中」蘇雙方意識形態的矛盾業已消失。據中共「世界經濟政治研究所」稍後出版的非公開雜誌「世界經濟與政治」所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王保勤等三人合撰「八十年代的中、美、蘇關係」一文透露，一九八一年十月廿二至廿三日在墨西哥的坎昆（Cancun）高峯會議後，美蘇對立激化，中共遂乘機調整其對外政策，即：加強獨立自主方針，與美國保持一定距離，同蘇聯改善關係。中共認為在美蘇之間採取有主導性的彈性政策比較有利^⑦。

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中共會將其對外活動重心暫時轉移到美國、日本與西歐，八十年代則又轉回第三世界。明顯的跡象是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聯合國秘書長的選舉。當時中共支持坦尚尼亞外長沙里姆（Salim A. Salim）而否決華德翰（Kurt Waldheim）連任，結果二人均落選，中共願望未遂。但據一位資深的非洲外交人員表示，中共投否決票對第三世界極關重要，這證明中共履行其一直宣布的對第三世界的承諾，並顯示其政與美國對抗^⑧。

註② 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四日）第一面。

註③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年四月三十日）第一版。

註④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六日）第二面。

註⑤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一日）「縱橫談」欄。

註⑥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第七面。

註⑦ 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五面。

註⑧ 「中共近期在國際間發動外交攻勢的背景和目的」，香港：〔南華早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

其時中共與美國關係冷淡，不時威脅要「倒退」。一九八二年三月廿四日，布里茲涅夫在塔什干演說中：(一)指摘中共對外政策，但不否認中共有社會主義制度；(二)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論，完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島的「主權」；(三)蘇聯對中國從無任何領土要求，願意討論加強邊境地區的互信措施；(四)回憶過去友好合作，認雙方敵視、疏遠非正常現象，願在沒有任何先決條件下，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當然不能損害第三國。並建議在經濟、科學、文化、政治方面，採取具體步驟，做為準備^②。中共對此作了溫和的反應。

同年九月中共召開「十二大」，制訂「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報告「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中，第五節為「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內容要點如左：

(一)強調「中國的對外政策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的科學理論為基礎的，是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它有長遠的、全局的戰略依據，決不遷就一時的事變，不會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動」。

(二)「中國決不依附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

(三)重申和平共處五原則，推廣「適用於我們同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一切國家的關係」。

(四)聲言「使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但指摘日本有些勢力「妄圖復活日本軍國主義」。

(五)希望同美國發展關係，但在臺灣關係法等問題上抨擊美國。

(六)指摘蘇聯的「霸權主義」，正式提出三大障礙，即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駐有大軍、援越侵柬、侵佔阿富汗。如果蘇聯採取實際步驟解除此等對中共安全的威脅，雙方即可「正常化」。

(七)聲稱中共屬於第三世界，「把堅決同第三世界其他國家一起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而鬥爭，看作自己神聖的國際義務」。

(八)提到黨與黨的關係，胡耀邦說：「我們黨堅持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發展同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的關係」。

鄧小平在「十二大」的開幕詞中，將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顛倒為：現代化、統一、反霸。

這是對外政策的又一次戰略性調整，而中共當前的外交活動，也正是循着上述方針推行。

七

意識形態、國家利益、權力鬭爭（包括在國際間及國際共黨間的影響、權威或地位），在中共對外政策中，由於國內政策的需要和國際環境的影響，其重點所在時或有所轉變，但決不會放棄其中任何一項。

中共仍抨擊美國，但一九八三年五月下旬，美國放寬對中共科技轉移的限制，將它由「P」類輸出管制國提升為「V」類。十一月十七日國務院和商務部宣布對中共科技轉移的新綱要，以及一九八四年三月中共軍事代表團赴美洽購武器，都是對北平有利的。中共目前已不再強求日本增加軍費，而是要「日本應把軍事能力限制在防衛需要的範圍內」^⑤，時或還揮擊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然而它不會放棄爭取日本，因為後者是它重要的經濟及貿易夥伴，日圓貸款、日本輸出入銀行的融資、民間商社在大陸的投資與經技合作，都是中共所需要的。藉着美、日的經技援助，可提高中共的實力，加強它「獨立自主」的立場，也增加它對蘇談判的資本。

中共不待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就把談判改稱「磋商」，同蘇聯恢復副處長級的接觸，如今官方接觸已提升到副總理級。中斷多年的旅遊、體育、文化等交流業已重開，貿易在增加，蘇聯可能協助中共整修若干舊工廠^⑥。這些也都對中共有利。

爲了同美國接近不致妨害北平同蘇聯改善關係，中共以「臺灣問題」等作爲剎車來控制其速度；爲了同蘇聯改善不致影響來自美、日的經技援助，北平又以「三大障礙」爲制動器。其實正如同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中國室」主任德留辛(L. P. Delusin)所說，中共所謂三大障礙，只是生意人喊的謊價而已^⑦！

在黨的關係方面，胡耀邦不提列寧主義而只提馬克思主義，是便於與反列寧主義的歐共主義共黨改善關係，事實上中共除對越共外，已和很多共黨增進了關係。但同蘇共之間仍未恢復關係^⑧。但德留辛說：「我認爲國家關係已經正常了。因爲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從邏輯上講，下一階段是確立兩黨的接觸」。他特別指出，「許多過去曾經是激烈爭論對象的意識形態上的問題，實際上是已經消失了」^⑨。德留辛的看法也許太樂觀了一些，但意識形態的衝突既已不存在，增進黨與黨的關係就容易得多。如果中共真能獲得胡耀邦所謂「獨立自主、完全平等……」的地位，則黨的關係終歸還是要恢復的。

上面所說意識形態爭論的消失，係指中蘇共黨之間而言。胡耀邦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共對外政策的理論基礎，所謂戰略實也以此爲依據。由此可知，從長遠觀點看，自由世界依舊是中共要埋葬的對象。目前的合作是策略性的，不是目

註① 入路透社V（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九日）北平電，臺北：〔聯合報〕（同月廿一日）第一版。

註② 一九八三年十月六日開始的「中」蘇第三輪磋商，討論過蘇聯協助整修它於五十年代協助中共建造的四家工廠的問題。

註③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八日）第二版。

註④ 安德洛波夫（Yury V. Andropov）死，胡耀邦未有唁電。

註⑤ 同③。

的。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共當前的基本外交政策是：穩住蘇聯，減少來自北方的威脅；拉住西方，利用各種機會爭取援助，加強本身的「獨立」地位，進而圖謀在國際社會中有發揮其影響力的權威，以便達成其改造世界的最終目的。中共與國際共黨普遍改善關係，是要擺脫過去在共黨行列中的孤立，鞏固自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與提高影響力。中共的世界革命方略仍然認定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革命，是當代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⑥。胡耀邦強調第三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任務是，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積極發展民族經濟，並倡導「南南合作」。中共外長吳學謙指摘西方發達國家轉嫁危機，使第三世界成爲經濟危機的最大受害者。聲稱第三世界國家強烈要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推進南北對話，改善南北關係^⑦。在在顯示中共將在第三世界積極活動的意向與方式。而這些並不背離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終極目的。

註⑥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上冊，一四頁。
註⑦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八日）第二版。

中共問題論集

郭華倫著

全書收錄有關中共問題之論文或報告計三十二篇；諸如中共黨史問題、中共的戰略策略與暴政及中共問題研究方法等，均有所評析，廿五開本，約卅萬字，四二六頁，全一冊，實售新臺幣一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三四三六號帳戶